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和互动

潘祥辉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为重新梳理和认识媒介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运用制度演化理论纵观中国百年来新闻发展史,审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种政治模式都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媒介制度的演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

关键词:媒介制度;政治制度;社团;工商业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1-0117-08

媒介制度与社会息息相关。英国传媒学者尼古拉斯·加汉姆在《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一书中指出:“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经深深地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说?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对其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来研究”^[1]。不论从历史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媒介制度,特别是媒介体制的生成、演化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迁的确难以分开。

一、媒介制度系统的耦合性与“互嵌”

媒介制度指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以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宏观管理制度、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构成了媒介的制度系统,媒介制度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制度系统一起构成了社会制度系统。

制度演化理论认为,制度系统间存在独立、耦合与互斥这3种关系,类似于生态学中不同物种之间的“互不影响关系”、“共生共存关系”和“竞争关系”。著名制度博弈论专家青木昌彦将制度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嵌入”、“捆绑”和“互补”。嵌入关系大体上是指各种制度的实施后果互相影响的关系;捆绑关系和互补关系也就是耦合关系^[2]。制度的耦合关系又可以分为“强耦合关系”和“弱耦合关系”。“强耦合关系是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导致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完全丧失功能;弱耦合关系是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降低而不是完全丧失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的功能”^[3]。由于制度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不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在媒介宏观管理体制、媒介采编制度与媒介经营制度3个层面的演变步骤并不统一。

一方面,媒介制度的演化取决于制度系统内部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如果从媒介制度系统内部的关系来看,媒介宏观管理体制、媒介采编制度与媒介经营制度这3个制度层面既有关联性,又有层次性。从关联性来看,这三者相互影响:媒介宏观

收稿日期:2009-10-26

作者简介:潘祥辉(1977-),男,江西黎川人,副教授,博士后。

管理体制与媒介采编制度的耦合关系要强于其与媒介经营制度的关系。在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与媒介经营制度的耦合关系最弱。媒介制度系统的层次性则表现在媒介宏观管理体制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而媒介采编制度与媒介经营制度都是前者的派生制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体制的安排状况。

另一方面,媒介制度变迁也取决于媒介制度系统与其他制度系统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及它们之间这种耦合关系的强弱。从媒介制度这3个层面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耦合关系而言,媒介经营制度与政治制度是弱耦合关系,因为媒介经营制度的变化不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功能变化,相反,它与经济制度系统的耦合性较高,经济领域的营销、管理、投资等模式的变化将直接传导到媒介经营制度;而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与政治制度是强耦合关系,每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对方制度功能发生改变,媒介制度通常随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变迁(文章重点论述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关系,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在此不予解释)。我们可以用集合的概念表示这种关系:如果把制度系统看作是一个集合的话,那么媒介制度集与政治制度集、经济制度集相互交错,其中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位于政治制度集内,媒介经营制度位于经济制度集内,而媒介采编制度则位于3种制度集重叠领域(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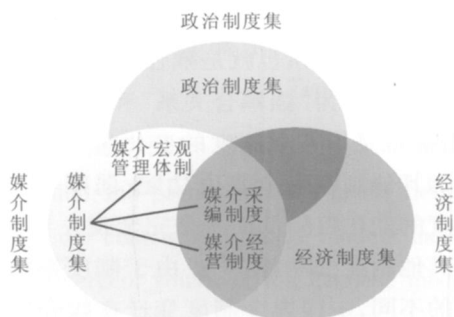


图1 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嵌入”关系

通过图1可知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嵌入”关系意味着,政治制度集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媒介宏观管理体制而影响媒介制度的变迁,经济制度集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媒介经营制度进而影响媒介制度。当经济制度集与政治制度集的演化不同步时,表现在媒介制度集上则是媒介经营制度的变革远远超出媒介宏观体制改造。而媒介采编制度介于这2种变化之间。

通过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以百年中国新闻史上的媒介宏观管理体制的发展和演变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媒介制度为何以及如何受制于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

二、制度耦合性决定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与政治体制同步演化

制度演化的规律表明,一个社会中单项制度或制度系统的演化首先与它的初始状态有关,其次与单项制度之间或制度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有关。它的演化规律通常是“具有强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会整体共时突变,具有弱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可能会整体共时突变,也可能按照最优次序整体历时渐变。具有层次关系的各项制度会逐步顺向扩展或者逆向扩展,具有独立关系的各项制度子系统的演化会遵循时序无关性原则随机演化”^[3]。显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都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尤其是媒介制度系统中的媒介宏观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4]。一般来说,媒介制度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宪政国家,媒介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在非宪政国家,媒介制度尤其是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往往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一部分,媒介制度受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制度变迁是亦步亦趋的。Keane等人关于媒体与政治的研究表明:“在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基础上,便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建构亦会导致媒介体制的建立,并影响媒介表现,因此,不同政制下的媒体和国家互动关系便会有所不同”^[5]。施拉姆所讲的报刊4种理论实际上是与4种政治制度相对应的。不同政治制度构成了媒介制度的最大约束条件,它设定了媒介的角色、活动范围及其功能。有学者指出,“威权主义下的报业体制,媒介从属于国家机器,其主要任务在于宣扬国策、阐扬政令。共产主义的报业体制中,媒介则是扮演煽动者、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的角色。而自由报业的思想却认为,媒介除了需要扮演告知信息角色外,媒介面对国家时,更需要采取监督,甚至对立的态度”^[6]。麦奎尔也

说:“媒介和政治密不可分。首先,每个国家都有经过政治体系协商而成的法律、管理与政策,这些制度对媒介的管理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了政治利益。其次,媒介会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必须顾及与政治的关系”^[7]。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同步演化,在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律《大清报律》及第一批新闻法规都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这和当时的政治改良是同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出现在1912年前后,这得益于辛亥革命后政治制度层面宪政体制的确立,但是当这种政治体制遭到袁世凯的篡改后,报刊审查制度便代替了出版自由制度,媒介自由也就名存实亡了,“癸丑报灾”使报刊总数由400多种下降到了100来种即是现实。1949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私营媒介随之消失。1956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人民日报》及其他地方党报纷纷改版,但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使得媒介改革中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3次重要的新闻改革,即1942年的《解放日报》的改版、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以及1978年以来媒介的“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无一不是与政治运动或政策变化相关联的。可见,政治变化对媒介制度的影响之深远。

近代至今,中国的政治变迁跌宕起伏。中国自19世纪起便开启了“千年未有之大局”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过程。在总结19世纪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时,萧功秦先生将其划分为6个时期或者说6次政治选择: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萧功秦认为:“六次政治选择”中的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第二次是从1911~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第五次是1949~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萧功秦将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的这6次政治选择,萧功秦用6个强人的名字进

行概括:即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8]。

相应地,每一种政治模式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这种媒介体制既可以通过这一时期颁布的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体现出来,而且也可以通过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媒介事件体现出来。这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表1来具体说明。

萧功秦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间节点置于洋务运动而不是鸦片战争这一点固然值得商榷,但这之后的概括无疑是简洁而精当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政治转型都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换句话说,媒介制度的演进与政治转型几乎同步。

政治制度的变化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也可以从前苏联的媒介制度变迁中看出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媒介体制”,媒介成为苏共党的喉舌,私营媒介全部改造成国有。这当然是由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斯大林时期强化了这一媒介体制。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苏联的媒介制度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传媒法》,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传媒法》。《传媒法》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2000年,普京亲政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再度调整,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遂转型为兼具英国的形式与法国管理内涵并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9]。由此可见,政治制度变迁与媒介体制演化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三、媒介制度变迁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高度相关

考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除了与政治制度同步外,媒介制度的演变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着一种

萧功秦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运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渗透于社会的基层细胞,通过执政党运用革命意识形态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来实现某种既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的政治模式。

何增科在《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政治转型》中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政治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权威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其中尤以官僚权威主义体制特征为主,因此又被称为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

表 1 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模式与媒介制度的同步演化

政治选择	政治模式	媒介宏观管理体制	媒介管理制度(成文规则)	标志性媒介事件
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 (1850~1910)	慈禧模式	极权主义模式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钦定报律》	1903年5月的“苏报案”、1911年7月《大江报》被封
早期议会民主 (1911~1913)	孙中山模式	自由主义模式 (言论、出版自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条款、1912年3月取消《暂行报律》	1912年6月,中国报界促进会通过“不认有报律案”
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1914~1928)	袁世凯模式	极权主义模式 (新闻审查)	1914年《报纸条例》、《出版法》;1915年《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等	“癸丑报灾”;1913年3月,袁世凯政府下令实施新闻预检;1917年5月北洋政府宣布实行新闻邮电检查;1915年邵飘萍遇害;1926年林白水遇害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 (1928~1949)	蒋介石模式	威权主义模式	1928年6月《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1929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30年《出版法》等	1932年蒋介石禁邮《申报》;1933年《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杀害;对左翼报刊及记者的封杀
全能主义计划体制 (1949~1976)	毛泽东模式	计划主义模式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1949年12月《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1950年《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等文件	取缔外国人创办的媒介;开展对私营新闻事业的改造;《大公报》改为《前进日报》;建立“条块分割”的媒介体制与媒介布局,媒介整合政治体制
后全能主义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 (1978年至今)	邓小平模式	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	1990年《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2年《新闻出版保密规定》、1997《出版管理条例》与《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06年《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2007年《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等	1978年财政部同意《人民日报》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年《解放日报》刊登广告;1985年《洛阳日报》自办发行;1987年《广州日报》扩版;1995年《华西都市报》诞生;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999年“博瑞传播”上市等

同步演化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发展、社会团体的兴盛以及工商业的繁荣都是媒介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们与媒介制度变迁互为因果,共同演进。

首先,媒介制度与社会教育的发达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变化同步演化。以近代中国媒介的出现与繁荣为例,近代新式学校的出现既为媒介培养了传播者,也为媒介培养了接受者。学校通过新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改变了受教育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为媒介的创办打下了人才基础和观念基础。

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的出现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媒介人才。在国人第一份成功报纸《循环日报》出现的1874年前后,中国受教育人口已经大大增加,许多人进入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西方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既为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储备了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报刊的读者群,对中国媒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剑桥晚清史》统计,1877年有6000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年上升为16836人,到1906年又上升为57683人。除2000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共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业学校。与此同时,国内教育也发展起来,随着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新式教育开始在中国兴起,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1866年在福州都成立了同样的学府。据学部统计,1904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总数仅为92169人,而到1909年则急增至1560270人^[10]。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

前夕学生数为 300 万,是 1905 年的 12 倍^[11]。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给中国媒介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早期新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渠道而不是报刊渠道,这其中大众媒介不发达的原因,也有社会结构中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太大比重的原因。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受教育人群的扩大,有文化的人群比例迅速提高,人口的文化结构得以改变,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成型,他们便成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论从政治、社会或文化的视角看,现代知识分子都与传统的士绅阶级有重要的不同。大体而言,这一阶层是在转型时代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在 20 世纪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传播新思想方面,他们是主要的社群媒体”^[12]。当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传播媒介就具备了担当的条件。报刊的出现很快使它替代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的传播功能,成为超过教育传播渠道的主要传播手段。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媒介是在新式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催化下逐渐演化出来的,并得以生存和发展。

其次,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团体的兴盛相始终。这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与国人第一次创办学会高潮的“同步”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史上,报馆与学会及社团同时出现。学会作为一种民间团体,类似于今天的“非政府组织”,又似“政党”的前身,它不同于政府机构,而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活动的组织。报业总是伴随着社会团体的发达、民间机构的发达而发达的。近代报业的诞生,尤其是政论报业的诞生直接源于学会。学会最早通过报纸进行启蒙,宣传新思想。尽管文人结社的制度在中国早已有之,但一直受到压制,现代意义上学会出现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创立的“广学会”,广学会创办的报纸《万国公报》在中国媒介史上影响深远^[13]。当“学会”这种团体形式在文人和官员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学会”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于是“学会”渐渐兴盛起来,报刊也随之兴盛。据统计,从 1895~1898 年,一共存在 76 个学会,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会是由士大夫阶层创建的,这些学会分设在 10 个省和 31 个城市,其中 25 个在内地。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学会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足的重要组织手段^[10]。学会一般都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其思想、主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实际上是国人第一

次创办学会高潮的产物。本文仅列举近代几份有影响的报纸与学会的渊源关系来看报刊与学会的同步演化脉络(表 2)。

表 2 近代学会与报刊的同步演化

学会	创办者	创办报刊	创办时间
广学会	林乐知等 传教士	《万国公报》	1868 年创刊, 1889 年复刊
北京强学会	康有为	《万国公报》(后 改为《中外纪闻》)	1895 年 8 月 17 日 1895 年 12 月 16 日
上海强学会	康有为	《强学报》	1896 年 1 月 12 日
南学会	江标、 唐才常等	《湘学新报》、 《湘学报》、《湘报》	1897 年 4 月 22 日 1898 年 3 月 3 日

从表 2 可见,创办报刊的高潮也即创建学会的高潮。学会的出现伴随着报刊的出现,先有学会而后有政论性报刊,先有西方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而后有中国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仅从康有为成立的强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等成立的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同名上这一点可以看出,维新派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在媒介制度上克隆了外国传教士的做法。社会团体的兴盛在五四时期与媒介的兴盛也是同步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五四后仅短短 1 年时间,各种新出版物就增加至 400 余种,与此相联系的是各种社团的崛起。“实际上,新期刊的大量涌现不过是社团崛起的伴生现象”^[14]。在“五四”新社团中,有著名的“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学会”、“新民学会”、“互助社”等,许多团体的机关刊物即以社团名称命名,如《国民》、《新潮》、《少年中国》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媒介的演化是与社会团体的发达息息相关的。

在 1894~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改良社会的自觉意识,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知识精英致力于办报来动员“舆论”,以实现中央政权的影响。梁启超分别于 1895 年和 1896 年创办了《强学报》和《时务报》,1898 年变法失败后又在日本创刊了《清议报》(1898)和《新民丛报》(1901)。严复仿照梁启超创办了《国闻报》(1897),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革命派也很快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如章炳麟的《苏报》(1897)、《国民日报》(1903)。据统计,到 1906 年,仅在上海已出版 66 种报纸,全国在这一时期发行的报纸总数达 239 种,知识分子群体是办报的主力。

1887 年 11 月 1 日,传教士办的“同文书院”在上海成立,1894 年后改译为“广学会”,它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它的英文名称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照字面直译为“在中国人中间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广学会的目的不只在出版基督教书籍,而也要通过出版物对中国人进行“启蒙”,使他们思想“开放起来”。实际上,《万国公报》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以后,中国人创办的报刊逐渐多起来。维新派、革命派等相继接过《万国公报》的办报传统,开始在中国的媒介领域唱起了主角,传教士的刊物在民国以后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总之,学会、学校、报刊这3种工具和机构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创立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和学会中,报纸被广泛阅读和讨论。这些启蒙工具和启蒙活动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结构,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第一次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的氛围。因为这些新的传播体系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宣扬,现代社会舆论的出现是18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新发展。正如论者所言:“在转型时代,报刊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12]。这种制度变迁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的启端,另一个就是公共舆论的展开。19世纪中叶以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萎缩,地方绅权的扩张,接管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形成一些‘国家机关’以外的公共领域。但这些发展都只是导致公共领域的间接因素,而上述三种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才是直接因素……那时,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报刊杂志、学校与学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12]。

当下正在进行的媒介制度变迁也是如此,媒体、学校与公共社团仍然紧密相联,共同演化。仅凭媒介或媒介从业人员本身的力量是无法推进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可以想象,NGO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会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没有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兴起,媒介的转型将无法实现。展江认为:新闻媒介无论是私营、公营还是国营体制,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有这样那样的日常联系。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中活跃的成员,并且与其他社团等非政府组织(NGO)有着积极的互动^[15]。实际上,社会结构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均衡的。K·巴基和S·巴里克曾经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4种类型:(1)强国家、弱社会;(2)强国家、强社会;(3)弱国家、强社会;(4)食利国家^[16]。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两者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尽管民国年间的政府相对衰弱,但社会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这直接决定了中国媒介的演化轨迹。随着当代中国改革的推进,多元

化利益的出现,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逐渐显现,客观上会促进媒介从单一的国家领域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即一种媒介制度的重新调整与安排,除了借助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力量,显然还需要其他社团的参与。

最后,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变也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同步。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媒介体制的自由化,但媒介的发展与转型总是奠定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媒介从政党报刊演化到大众报刊是商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经济环境的变化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中国媒介的演化似乎也遵循这一规律,至少晚清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说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资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市民阶层逐步出现。这既为中国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也为其准备了消费市场。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商业投资涌向了媒介领域,从而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商业媒介;工商业的发展也为媒介提供了经济来源,使得媒介能够依赖广告而生存;同时通过学习效应,媒介还可以借鉴工商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媒介的演化。中国近代以来媒介的演化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始于19世纪前后,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移植西方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结果。此时中国的机器工业开始出现,中国开始逐步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受到一定的冲击,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894年,中国大约有216个机器矿产和小型公司,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办,工人总数为9万至10万。中国城市自1840年以后也开始发生变

例如,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鼓励学生阅读《时务报》。它们创造了一种活跃的思想气氛,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影响日益扩大。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也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有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化,一些城市在开辟通商口岸、建设工厂企业中兴起。1843~189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2 072万增至2 350万,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由5.1%上升至6%^[17]。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社会阶层分化和人口流动加快,出现了工商业者、教师、店员、工人等不同阶层,这为近代报刊的产生准备了社会条件。

在社会结构上,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兴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阶级越来越具影响力,在传统的官僚阶层之外,实业家或企业家成了另一个相对强势的阶层。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最早在一些沿海港口城市产生,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规模迅速壮大。辛亥革命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商业组织遍地开花就是一个例证。据统计,1912年,农商部列举的主要和次要的商会就有794个,计有196 636个会员。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万至200万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远比军官的数目(17 000人)以及学生的数目(30 000人)、归国留学生的数目(35 000人)、官员的数目(50 000人),甚至比上层绅士的数目(200 000)都多得多^[10]。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工商业继续发展,1917~1923年堪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出现。以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为例,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银行,而在1912年末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就有140家^[10]。这些最具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开放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变革,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投资报业,如实业家张謇、史量才投资《申报》,吴鼎昌投资新记《大公报》等,此外如狄楚青、张竹平等都是以实业家的身份进入报业领域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及商人阶层的出现,就不会有中国的商业媒介。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都市化进一步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中国媒介的出现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近代第一份国人自办成功的精英报刊《循环日报》出现在经济相对繁荣的香港,《申报》、《新闻报》能够在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出现决非偶然。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媒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同步演化只是一种现象,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集权主义的媒介制度一定会向自由主义的媒介

制度转型,新加坡的媒介就是一个例子。但经济的发展的确可以加速媒介制度变迁,至少工商经济的发展内在地需要新闻自由。经济的繁荣源自效率的改善,效率的改善源于企业间的竞争,企业间的竞争需要完全、透明的信息,完全、透明的信息客观上需要新闻自由。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的研究指出: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18]。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以金融、证券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新闻自由,因为“信息透明”是金融、证券等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透明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反过来,新闻自由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另外,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改变社会结构、人口结构、观念结构进而影响政治制度安排,再传导到媒介体制上来,也可能通过创造市场需求,提供制度示范给媒介以直接影响。

四、结 语

由于媒介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耦合性”,这种“耦合性”决定了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形成了某种关联与互动。显然,媒介制度结构也深深“嵌入”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其变迁与社会的政治变迁或经济社会变迁保持高度的关联性。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百年新闻史上的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与互动,为理解当下的中国媒介变迁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 [1] 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M].李 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2]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3] 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为了证明这一点,陈志武先生根据 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把这些国家分为3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只占48.5%。当他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出的结论不变。由此他认为,“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 社, 2007.
- [4] 浦兴祖.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5] Keane, John.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6] 管中祥. “国民党国机器”操控媒介资讯形式的转变 (1924~1999) [J]. 传播与文化, 2000, 9(4): 163-201.
- [7] 麦奎尔. 大众传播理论 [M]. 崔保国, 李琨,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8] 萧功秦. 中国的大转型: 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 [9] 吴非. 俄罗斯广电体制的过渡 [EB/OL]. (2008-02-19) [2009-05-07].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442956K>
- [10] 费正清, 刘广京. 剑桥中国晚清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1] 桑兵.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革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 [12] 张灏.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13] 王林. 西学与变法: 《万国公报》研究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 [14] 许纪霖, 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15] 展江. 新世纪的舆论监督 [J]. 青年记者, 2007, 66(6): 25-28.
- [16] K·巴基, 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J]. 孙立平, 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3, 13(1): 67-72.
- [17]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8] 陈志武. 媒体、法律与市场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ocial change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a

PAN Xiang-hu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media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s deeply “embedded” in society’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maintains a high degree of relevance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ocial, political or economic changes. With the strong coupling between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edia system, the later depends largely on the form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every kind of political model corresponds to a media system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e evolution of media institution keeps a synchronous relations with school education,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groups, as well as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system “coupling” in the system inside and outside can explain the level and regularity of China’s media system evolution.

Key words: media institution; political system; cooperation; business